

## 归化异化视角下《双城记》两译本中的修辞格翻译对比研究

覃慧星, 周照兴\*

广西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西柳州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文学作品的翻译在促进文化交流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双城记》作为一部世界经典名著,采用了多种修辞手法以描绘当时的社会矛盾和人物形象。本文旨在对罗稷南和宋兆霖的中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其在《双城记》中主要修辞格的翻译策略。研究采用了文本分析法,重点考察两位译者对排比和比喻等修辞手法的处理方式。结果表明,罗稷南在翻译过程中倾向于使用异化策略,通过逐词翻译和直译等方法,力求忠实于原文,体现了源语文化的归宿原则;而宋兆霖则更倾向于归化策略,采用改译和套译等灵活手法,以目的语读者易于接受的语言进行翻译,强调了目的语文化的归宿原则。通过对两种翻译策略的比较,本文揭示了翻译过程中文化差异的影响以及不同策略对读者理解的影响,为今后的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

**【关键词】**《双城记》; 修辞格; 文学翻译; 比较分析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 2023 年度广西哲社项目(编号: 23WYL002)“新时代背景下‘用英语讲好广西故事’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机制研究”和 2024 广西科技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编号: GKYC2024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24 年 12 月 19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1 月 19 日

**【DOI】**10.12208/j.ssr.20250030

###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of rhetorical devices in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A Tale of Two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Huixing Qin, Zhaoxing Zho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uzhou, Guangxi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globalization, the translation of literary works has taken on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cultural exchange. *A Tale of Two Cities*, as a world classic, employs a variety of rhetorical devices to depict the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character images of its time. This paper aims to conduc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versions by Luo Jinan and Song Zhaolin, exploring thei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major rhetorical devices in *A Tale of Two Cities*. The study employs textual analysis method, focusing on the two translators' handling of main rhetorical devices such as parallelism and metaph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Luo Jinan tends to use a foreignization strategy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striving for fidelity to the original text through literal and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reflecting the principle of source language culture; while Song Zhaolin prefers a domestication strategy, using flexible methods such as adaptation and calque to translate into a language more readily accepted by the target language readers, emphasizing the principle of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By comparing the two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impact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how different strategies affect reader comprehension, providing new perspectives and insights for future translation studies.

**【Keywords】** *A Tale of Two Cities*; Rhetorical devices; Literary translation; Comparative analysis

#### 1 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文化交流愈发频繁,文学作品作为文化的载体,承载着各国独特的精神内涵。

因此,文学作品的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双城记》<sup>[1]</sup>作为全球文学经典之一,在英国文学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该作品蕴含着鲜明

作者简介:覃慧星,广西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英语笔译;

\*通讯作者:周照兴,广西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

的人道主义精神, 通过丰富的修辞手法描绘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及其在法国大革命背景下所面临的社会矛盾。这些特征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尤其是在意象、人物形象及人道主义精神等方面的研究<sup>[2]</sup>, 而对于其修辞格的翻译研究仍然存在较大的探索空间。

在文学翻译领域, 修辞格的翻译重要但难度较大, 译者需具备扎实的修辞能力<sup>[3]</sup>。修辞格用于塑造情感、描绘场景和展示人物特征, 还涉及语言、文学与文化等多个层面, 是语言与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比分析罗稷南<sup>[4]</sup>和宋兆霖<sup>[5]</sup>两位译者的《双城记》中译本中的修辞格翻译, 能深化对中西文化差异的理解, 提升跨文化交流的效果。

## 2 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

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sup>[6]</sup>首次提出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归化和异化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 而是在翻译实践中动态、辩证地存在的。它们可以在同一个翻译文本中并存, 只是根据具体的翻译目的和策略, 各自的比重和应用范围有所不同<sup>[7]</sup>。

归化(Domestication)是指将源语言文本的文化和语言特征进行调整, 使其更符合目标语言的文化, 从而使翻译作品更易于被目标读者理解和接受<sup>[8]</sup>。在归化策略中, 意译、仿译、改译和创译这四种方法都是以译文接受者为中心<sup>[9]</sup>。

异化(Foreignization)则强调保持源语言文本的文化和语言特征, 突显翻译的外来性质, 帮助目标读者体验源语言文化的独特性和差异<sup>[8]</sup>。而异化策略中, 零翻译、音译、逐词翻译和直译等方法主要是以原文作者为导向<sup>[9]</sup>。在这些翻译方法中, 零翻译、音译和逐词翻译通常不需要特别的翻译技巧, 而其他五种方法在实际应用中都涉及各种翻译技巧, 分别为增译、减译、分译、合译及转换五种。

## 3 《双城记》两译本中修辞格翻译的对比分析

### 3.1 排比(Parallelism)修辞格翻译对比分析

排比是一种富有表现力的修辞手法, 通常由三个或更多的词语或句子组成, 这些词语或句子结构相同或相似, 意义相关, 语气连贯。在表达上, 排比往往遵循从轻到重、从低潮到高潮的逻辑顺序, 以增强语言的节奏感和说服力。在《双城记》中, 作者巧妙地运用排比来深化主题, 展示层次丰富的情节, 并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罗稷南采取翻译方法更倾向于异化, 通过直译和逐词翻译保留了原文的语言特征和修辞效果, 但可能牺牲了一些译文的流畅性和文化适应性。而宋兆霖则是使用更倾向于归化的翻译方法, 通过增译和套译

法使译文更加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和文化特征, 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和情感传达。

例 1:

ST: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o Heaven,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he other way.

罗稷南译本: 这是最好的时候, 这是最坏的时候; 这是智慧的年代, 这是愚蠢的年代; 这是信仰的时期, 这是怀疑的时期; 这是光明的季节, 这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之春, 这是失望之冬; 人们前面有着各样事物, 人们前面一无所有; 人们正在直登天堂, 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宋兆霖译本: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 那是最糟糕的时代; 那是个睿智的年月, 那是个蒙昧的年月; 那是信心百倍的时期, 那是疑虑重重的时期; 那是阳光普照的季节, 那是黑暗笼罩的季节; 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 那是让人绝望的冬天; 我们面前无所不有, 我们面前一无所有; 我们大家都在直升天堂, 我们大家都在直下地狱。

原文中从第一句开始到第四行都有同样的句式“it was+名词短语”, 由此构成了一句排比句。两位译者都很好保留了原文中的排比结构, 但两位译者在具体表达上略有不同。罗稷南的译文忠实于原文的结构和节奏, 通过逐词翻译的方法, 保留了原文的对称性和音韵美。这种翻译策略体现了异化的特点, 即尽可能地保留原文的语言特征和文化色彩, 让读者感受到原文的风格和情感。其译文在形式上与原文保持了高度一致, 使得读者能够直接体验到原文的文学魅力。宋兆霖的译文则更注重译文的流畅性和读者的阅读体验。他通过增译的方式, 增加了修饰语以提高表达效果, 如将“belief”译为“信心百倍”“incredulity”译为“疑虑重重”“Light”译为“阳光普照”“Darkness”译为“黑暗笼罩”。这种策略使得译文更加贴近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 降低了外来文化的陌生感, 体现了归化的特点。其译文在传达原文主题的同时, 也考虑到了读者的文化适应性, 使得译文更加易于理解和接受。

例 2:

ST: My friend is dead, my neighbour is dead, my love, the darling of my soul, is dead.

罗稷南译本: 我的朋友死了, 我的邻人死了, 我的爱人, 我的灵魂的亲爱者, 死了。

宋兆霖译本: 我的朋友去世了, 我的邻人去世了, 我的爱人、我的情之所钟也去世了。

原文中由三个“is dead”构成排比句式, 罗稷南和宋兆霖的译本都很好地保留原文的排比修辞格, 分别译为“死了”和“去世了”。罗稷南的译文忠实于原文, 采用了直译的方法, 尽可能地保留了原文的字面意义。然而, 这种直译可能导致译文略显僵硬, 如“灵魂的亲爱者”这一表达在中文中并不常见, 从而影响读者对原文情感的理解和共鸣, 体现了异化的翻译特点。在中文语境中“死了”一词的使用较为直接和生硬, 可能缺乏对逝者应有的尊重和哀悼的情感色彩。而宋兆霖的译文则采用了更为灵活和贴近目的语读者的套译法, 用“情之所钟”替换了“灵魂的亲爱者”, 这一表达在中文中更为常见, 意味着感情所专注或钟爱的对象, 更符合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同时, 使用“去世”而非“死”, 更符合中文的语境与文化特征, 体现了归化的翻译特点。这种翻译不仅保留了原文的情感强度, 还增加了对逝者的尊重和哀悼之情。

例 3:

ST: The wine was red wine, and had stained the ground of the narrow street in the suburb of Saint Antoine, in Paris, where it was spilled. It had stained many hands, too, and many faces, and many naked feet, and many wooden shoes.

罗稷南译本: 酒是红色的, 已经玷污了巴黎近郊圣安东尼区的这窄街地面(它泼出来的地方)。它也曾玷污了许多手、许多脸、许多赤脚、许多木鞋。

宋兆霖译本: 洒出的酒是红葡萄酒, 它染红了巴黎近郊这个圣安东尼区狭窄街道的地面, 也染红了许多双手, 许多张脸, 许多赤脚, 许多木鞋。

本句中后面一句, 连续出现了“many+名词/名词短语”结构, 构成了一句排比。罗稷南的译文采用了逐词翻译的方法, 保留了原文的排比修辞格, 但“玷污”一词在中文中可能显得过于生硬, 缺乏对情境的细腻描绘。这种直译的方法体现了异化翻译的特点, 即尽量保持原文的文化或语言特征。异化翻译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 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 来传达原文的内容, 即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宋兆霖的译文则采用了增译的方法, 增加了量词“双”“张”, 中文多用量词, 这些量词的使用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 同时保留了原文的排比句式。此外, “染红”一词的使用比“玷

污”更为生动, 更符合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 增强了译文的情感传达。这种翻译体现了归化翻译的特点, 即要把源语本土化, 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 采取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

### 3.2 比喻 (Metaphor) 修辞格对比分析

比喻是通过将两种看似不相关的事物进行直接比较, 以增强语言的形象性和易于理解性。在《双城记》中, 作者巧妙地运用了丰富的比喻, 为作品增添了色彩和深度。罗稷南在翻译比喻时多采用直译的方法, 力求忠实于原文的表达和文化特质, 这种策略体现了异化的特点。宋兆霖则更倾向于采用归化的策略, 通过灵活运用词汇和调整表达方式, 使译文更贴近目标语言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预期。

例 4:

ST: There was a steaming mist in all the hollows, and it had roamed in its forlornness up the hill, like an evil spirit, seeking rest and finding none.

罗稷南译本: 山谷里到处都弥漫着悠悠灰雾, 孤寂地漫游上山, 好象一个恶灵, 寻找安息之处而不可得似的。

宋兆霖译本: 所有的低谷洼地里都弥漫着腾腾雾气, 雾气阴森森地在往山上游荡, 像一个负罪的幽灵, 想要找一个安息之地而毫无所得。

例 4 中, 从“like an evil spirit”可以很明显看出这是一个比喻句, 原文将“mist”比作“evil spirit”, 也侧面形容当时的环境的动荡不安。罗稷南将其直接译为“好象一个恶灵”, 其中, “恶灵”与“evil spirit”表达的含义相符, 还保留原文的句式特征, 忠实了原文, 体现了异化的翻译特点。宋兆霖则是译为“像一个负罪的幽灵”。在查找牛津字典时, 发现“evil”作为形容词时, 表达的含义有“恶魔的; 罪恶的; 讨厌的; 令人作呕的; 使人不舒服的”的意思, 并没有“负罪的”这一层含义, 在这里, 宋兆霖采取了改译的翻译方法, 即为了符合目的语的阅读或是表达习惯, 将“evil spirit”译为与原词不相符的意思, 以降低目的语读者对外来文化的陌生感与抵触, 体现了归化的翻译特点。

例 5:

ST: The mildew inside of the coach, with its damp and dirty straw, its disagreeable smell, and its obscurity, was rather like a larger dog-kennel.

罗稷南译本: 邮车里面乌烟瘴气, 连带着潮湿肮脏的草褥, 很象是一个较大的狗窠。

宋兆霖译本: 车厢里, 霉气冲天, 铺的麦秆又湿又

脏, 气味难闻, 而且光线昏暗, 很像一个大狗窝。

例 5 中, 将 “The mildewy inside of the coach” 比作 “a larger dog-kennel”, 两个译本也都保留了比喻的句式结构。罗稷南译本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 通过调整语序、合译和语义转换, 将原文中的多个细节合并为 “邮车里面乌烟瘴气”, 这样的翻译使得译文更加符合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 但可能会牺牲一些原文的细节和情感色彩。而宋兆霖译本则倾向于异化的翻译策略, 通过变词组为句的方法, 详细描述了车厢内的环境, 如 “霉气冲天” “铺的麦秆又湿又脏” “气味难闻” 和 “光线昏暗”, 这样的翻译保留了原文的异域特色, 让读者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原文描述的具体环境。

#### 例 6

ST: Not a word was spoken, not a sound was made. She stood, like a spirit, beside him, and he bent over his work.

罗稷南译本: 没有言语, 没有声音。她象一个幽灵似的站在他旁边, 而他只是低头工作。

宋兆霖译本: 没有说一句话, 也没有出一点声音, 她像个精灵, 站在他的身旁; 而他, 则只顾埋头干活。

在例 6 中, 原文将 “She” (即马内特·露西) 比作 “spirit”, 两位译者都很好的保留了比喻的修辞句式, 但在选择词汇上有所不同, 体现了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罗稷南的译本采用了异化的策略, 将 “spirit” 直译为 “幽灵”。这种直译保留了原文的文化色彩和形象, 但 “幽灵” 在中文中可能带有一些负面或恐怖的联想, 这可能与原文中 “spirit” 所要传达的轻盈、超然的形象有所差异。其词汇的选择体现了对原文文化特质的尊重, 但也可能导致读者的理解和感受与原文有所偏差。而宋兆霖则采用了归化的策略, 将 “spirit” 译为 “精灵”。“精灵” 在中文文化中通常与美好、神秘和正面的形象相关联, 这样的翻译更容易被目标语言的读者接受, 因为它符合读者的文化预期和审美习惯。宋兆霖的选择通过使用 “精灵” 一词, 可能更能传达原文中 “spirit” 所要表达的轻盈和超然的感觉, 同时也增强了读者对原文情感的理解和感受。

#### 4 总结

《双城记》作为一部描绘社会矛盾和人物形象的世界文学经典, 其丰富的修辞手法对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研究对比分析了罗稷南和宋兆霖的中译本, 探讨了他们在翻译中对排比和比喻等修辞格的处理策略。罗稷南倾向于采用异化策略, 通过直译和逐词翻译来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特征, 这种方法虽然忠实于

原文, 但可能会牺牲译文的流畅性和文化适应性。相反, 宋兆霖则采用归化策略, 通过改译和套译等方法使译文更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和文化特征, 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和情感传达。这两种策略各有优势, 也各有局限性, 但都体现了翻译过程中对原文忠实度和目标语言适应性之间微妙平衡的追求<sup>[10]</sup>。

罗稷南和宋兆霖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展示了在忠实原文和适应目标文化之间寻求平衡的挑战。文学作品的翻译应平衡忠实原文与适应目标文化之间的关系, 同时强调译者的修辞能力和跨文化交流意识。这要求译者在翻译时充分考虑目标读者的接受度和文化背景, 以提升翻译作品的跨文化传递效果, 为未来的翻译实践和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 参考文献

- [1] Dickens C. A Tale of Two Cities [M]. Cambridge: Gawthorn, 1949.
- [2] 林金芳. 《双城记》分析角度纵览及探讨[J]. 文学界(理论版), 2013, (01): 218-219.
- [3] 冯全功. 翻译修辞学论纲[J]. 外语教学, 2012, 33(05): 100-103.
- [4] 狄更斯, 罗稷南译. 双城记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 [5] 狄更斯, 宋兆霖译. 双城记 [M].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2.
- [6] Venuti L. The Translator' Invisibility [M]. London: Routledge, 1995.
- [7] 冯全功. 试论归化和异化的生成动因与三个层面[J]. 中国翻译, 2019, 40(04): 5-13+188.
- [8] 张婷. 韦努蒂 “异化翻译” 理论的元理论研究[J]. 上海翻译, 2022, (02): 18-23.
- [9] 熊兵. 翻译研究中的概念混淆——以 “翻译策略”、“翻译方法” 和 “翻译技巧” 为例[J]. 中国翻译, 2014, 35(03): 82-88.
- [10] 徐志伟. 英汉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策略对比研究[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06): 138-142.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 (OAJRC) 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